· 中外音乐文化交流 ·

广州洋商与中西文化交流

——内森 · 邓恩（Nathan Dunn）“万唐人物”中的中国乐器及其在英美的展示（1838 – 1846）

宫宏宇

（尤尼坦理工学院，新西兰）

摘　要：1831 年，美国商人内森 · 邓恩（Nathan Dunn，1782 – 1844）离开广州回国。与其他外商不同的是，邓恩回国时不仅带走了财富，还带回了一整船包括中国乐器、戏装和道具在内的中国物品。1838 年至 1846 年间，邓恩在费城和伦敦公开展示他自称为“万唐人物”的中国藏品。邓恩是谁？他为什么对中国的物品如此上心？他的搜藏中包含了什么样的中国乐器？他这些乐器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搜集来的？他带回美国的这些中国乐器是否产生过影响呢？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邓恩的展品又有何意义呢？文章拟就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关键词：内森 · 邓恩（Nathan Dunn）；“万唐人物”；中国乐器；文化传播
DOI：10. 3969/j. issn. 1008 – 7389. 2012. 04. 020
中图分类号：J609.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7389（2012）04 – 0151 – 08

1831 年，一个叫内森 · 邓恩（Nathan Dunn，1782 – 1844）的费城商人离开了他工作和居住了 12 年的广州，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美国。与其他外商不同的是，邓恩回国时不仅带走了他一生也用不完的财富，他还带回了一整船的中国物品。有意思的是，他带到美国的物品中，除艺术品、农具、兵器、生物和矿物标本以及中国人日常的生活用品外，还包括相当数目的中国乐器、戏装和道具。

邓恩是谁？他为什么对中国的物品如此上心？他的搜藏中包含了什么样的中国乐器？他这些乐器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搜集来的？他带回美国的这些中国乐器是否产生过影响呢？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邓恩的展品又有何意义呢？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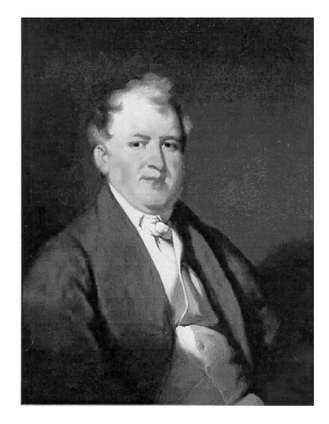


图 1　内森 · 邓恩肖像①

对熟悉中美早期贸易史的人来说，内森 · 邓恩不应该是个陌生的名字。作为中美贸易的先驱之一，邓恩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费城颇有声望，是费城人所熟知的商人、慈善家和社会名流。他 1782 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萨拉姆城（Salem County），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父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他是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的。虽然父亲留下遗嘱

收稿日期：2012 – 11 – 02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国际传播与推广”（10JZD0011）。
作者简介：宫宏宇（1963 – ），男，新西兰籍华人，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高级讲师，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海外汉学、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国音乐史研究。

① 英国画家乔治 · 钱纳利（George Chinnery 1774 – 1852）所绘的邓恩肖像，现存费城艺术博物馆。

是让他学一门手艺，但他却违背了父愿，在 1802 年跑到费城去给一个商人当学徒，1805 年又和别人合伙做生意。结果不仅血本无归还负债累累，到 1816 年因欠债太多无法偿还被宣布破产，他所属的费城教友会（the Society of Friends）也因此开除了他的会籍。走投无路时，他决定像许多费城商人那样，到中国去碰碰运气①，于是就于 1818 年春只身来到了“一口通商”的广州，先是为别的美商打工，后来开了自己的贸易公司“Nathan Dunn and Co.”。在广州“夷馆区”驿居的 12 年间，邓恩因为人和善、守信用，且是洋商间少有的极力反对贩卖鸦片的外商，所以在广东十三行商间颇有口碑。也由此得到了当时为世界首富的怡和行主伍秉鉴（伍浩官，1769－1843）和同孚行商潘正炜（潘启官三世，1791－1850）的鼎力相助②。到决定打道回府时，来中国时一文不名遍身是债的邓恩已是盆满钵溢。1831 年 1 月 6 日，邓恩带着他历年来耗资 5 万多美元搜集来的中国物品启程经伦敦回国。

回到美国后，邓恩在连本带利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费城建筑师为他设计并建造了一幢大的中国式房屋，美名曰“中国精舍”。除安置他的中国藏品外，“中国精舍”还有思念中国之意。需要说明的是，邓恩搜集中国物品并非只是为了自己观赏，而是有普及教育之意。所以他的搜藏手法和理念是百科全书式的。为了让更多的美国人通过他的收藏品来全面了解中国，1838 年他应费城博物馆公司负责人之邀，斥资两万美金购地，修建新的费城博物馆。之后，他又花费 8 千美金将他的中国艺术品安置在馆中并以每年 1600 美元的租金承租了该博物馆的整个一层楼面来展示这些藏品。[1]15－17但是这间长 163 英尺、宽 70 英尺由 22 个木制壁柱支撑的高拱顶展厅仍不够大，无法将他的近万件藏品以实景模型的方式全部展出。不得已，他只好采用分批的办法轮换着展。[2]102 1838 年 12 月“中国博物馆”（邓恩自己称“万唐人物”展③）开展时，除了陈列展品的 53 个玻璃展柜和精心搭建的广州街景外，还有多彩的屏风、字画、漆器、各种形制的灯笼、雕梁画栋上书写的中国谚语格言和邓恩用了近 3 年的时间请人精心制作的真人大小的塑像 50 樽。如此大规模地用实物再现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百态，不仅在美国，在欧洲也还是第一次④。“万唐人物”的展出，不仅吸引了费城人的注意力，也得到了来费城的英国人的好评。[2]113－118据报道，“万唐人物”展从 1838 年 12 月 22 日正式开始公展到 1841 年移师伦敦为止，共有十万多人前来观展，“万唐人物”的公开展出令美国观众第一次从实物上而不是从书本上目睹了中国日常生活和传统文化之美。[3]61－69

---

① 关于费城商人与早期的中美贸易往来，海外（特别是美国）学者已有相当深度的研究，请参见 Jonathan Goldstein：*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1682－1846*：*Commercial*，*Cultural and Attitudinal Effects*.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Jean Gordon Lee：*Philadelphians and the China Trade*，1784－1844；Philadelphia：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1984。

② 特别是 1822 年十三行街大火，如没有潘正炜召集 80 个工人帮他转移藏货，邓恩定遭灭顶之灾。关于邓恩与广东行商伍秉鉴和潘正炜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 John Rogers Haddad 有较详细的介绍，详见 John Rogers Haddad：*The Romance of China*：*Excursion to China in U. S Cultur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87－93。

③ 关于邓恩为其展览所起的“万唐人物”名，当时已有评论者认为有语误。用“唐人万物”似乎更贴切。见“Review of William Langdon's 'Ten Thousand Things'，”*Chinese Repository*，12. 11（November 1843）：561。

④ 关于邓恩及其“万唐人物”展，除英国学者 Helen Saxbee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博士论文外，近期的研究以美国学者为著，可参见 John Haddad：“The Romantic Collector in China：Nathan Dunn's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21. 1（Spring 1998）：7－26；Steven Conn：“Where Is the East?：Asian Objects in American Museums，from Nathan Dunn to Charles Freer，”*Winterthur Portfolio*，35. 2/3（Summer－Autumn，2000）：157－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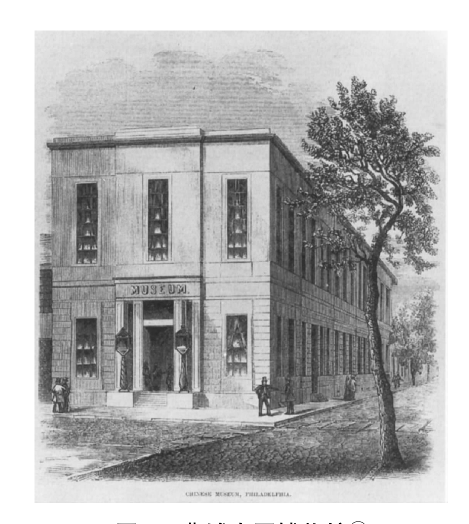


图 2　费城中国博物馆①



图 3　费城“万唐人物”展入口②

一、“万唐人物”展中的中国乐器及戏曲服饰

邓恩究竟带回美国多少种中国乐器现在已不可考，但他在费城“万唐人物”展中所陈列的中国乐器（展品第 14 柜）却至少有 20 多种。据 1839 年在费城出版的导览手册《万唐人物——费城中国万物展目录说明册》所示，费城博物馆中国馆展出的乐器不仅有广东音乐常用的“五架头”（二弦、提琴、三弦、月琴、横箫）外，还有洞箫、笛、扬琴、笙、琵琶、管、鼓、琵琶、夹板、铜号、唢呐、铙、钹、锣，以及佛教寺庙中各种铜制的喇叭、铜铃、云锣、木鱼、铛、罄及大鼓、小鼓等。[4]62－63此外，为了展现音乐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在第四个玻璃展柜中，他还展示了“中国贵妇弹月琴”（Chinese lady of rank，with guitar）的塑像。[4]14－16在展示中国婚丧嫁娶节庆祭祀的社会习俗时，也涉及到音乐。

除中国乐器外，邓恩还通过活生生的展品让费城观众对中国的戏曲艺术有了直观的感受。“万唐人物”展的第 5 个展柜中不仅有“身着华丽戏装的悲剧演员”和“两个小演员扮演女角”的彩塑，还有戏装、道具、仪仗伞、盔头及精心绣制的帐幔等。显然是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这一娱乐形式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邓恩在他的《万唐人物——费城中国万物展目录说明册》中对中国民众对戏曲的喜爱、戏曲的表演场所、演员的社会地位、剧目的选择等都有简单的陈述。[4]16－18

需要指出的是，邓恩非音乐家，对音乐似乎也无特别偏爱。他对中国乐器和中国戏曲服装道具的收集是与他全面展示中国的宏大构想分不开的。由于在音乐上没有专长，他在对他收藏中的乐器的解说也就显得平铺直叙而无深度。如在解释“箫”和“三弦”两种乐器时，他只是简单地写道：“展品 639 号：中国笛子，［中文］叫‘sew’；展品 640 号：吉他，［中文］叫‘sam－yeen’”。不过，他偶尔也会对乐器所用的材料、构造、音响效果及功用做简单的解释，如：“展品 642 号：黑檀木吉他，球体蒙有蛇皮，中文名字叫‘ou－pa’；展品 643 号：一种被称为‘sung’的吹管乐器，其所发出的声音与苏格兰风笛音乐相似”；“展品 644 号：吉他，［中文］叫‘yue－kin’，或曰‘月亮形制的里拉琴’喻其圆体形状”。但即使是如此简单不加价值判断的解说词，我们也可从字里行间窥见他对中国音乐的态度。整整 21 条解说词没有一句嘲讽贬低中国音乐的话。相反，邓恩有时还会流露出对中国音乐的赞赏之情。如他在谈到扬琴时，就提到该乐器“与手摇风琴很相似，其音调异常的清澈，旋律优美”[4]62。谈到中国大家闺秀所应具有的修养和才艺时，他也注意到了音乐、绘画、刺绣的重要性，并提到中国乐器无论在种类和取材上都多

① 资料来源：Illustrated News，June 4，1853。

② 见文末参考文献[11]。

种多样，乐器和家具一样是大户人家闺房中不可缺少的。[4]16

在 19 世纪的西方，并不是每个人都以如此客观和宽容的态度对待中国音乐的。1794 至 1795 年间曾随荷兰使团至北京觐见乾隆帝的法国人克里斯蒂安·德经（Chrétien – Louis – Joseph de Guignes，1759 – 1845）称中国音乐是“可怕的喧骚”（‘frightful racket’— bruit epouvantable）。1819 年 9 月至 1820 年 1 月曾在广州逗留过的费城商人、有“美国第一个汉学家”之称的小罗伯特·沃恩（Robert Waln，Jr，1794 –1825）[5]甚至说中国乐队乐器所发出的音响绝对配得上“音乐地狱”的称号。邓恩在广州经商时的朋友、费城人威廉姆·伍德（William W. Wood）也觉得中国音乐嘈杂喧闹“令人毛骨悚然”，“表演者的主要努力似乎就是丝毫不考虑节拍不管不顾地制造噪音。”[6]155就连没有去过中国的卫瑛斯（Enoch Cobb Wines，1806 – 1879）在其为配合邓恩“万唐人物”费城展所编写的《中国管窥》一书里，也不忘引用小德经、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1795 – 1890）、惠纳（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1765 – 1847）等对中国音乐的评论，来表示对中国音乐的鄙视。[7] 67 –68而卫瑛斯所引的诸如“中国音阶很不完善”、“中国人对半音、对位法、多声音乐毫无所知”、“不管有多少个表演者，旋律总是一个”、“中国人从不尝试和声”类的词句在邓恩本人的《万唐人物——费城中国万物展目录说明册》是见不到的。

二、“万唐人物”展在伦敦(1842 –1846)

邓恩并不满足只在美国展示中国物品，他还希望通过他的展品来增强英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进而达到改变英国政府对中国所持的敌对态度的目的。1841 年 12 月，邓恩在结束了为期 3 年的“万唐人物”费城展后，将重达 4 吨的展品全部装上船，移师伦敦①。1842 年 6 月 23 日，“万唐人物”的 1340 多件展品在新址靠近伦敦海德公园角的一幢长 225 英尺宽 50 英尺的展厅正式开展。在开展前，邓恩按照英美惯例，特地邀请了包括维多利亚女王、阿尔伯特亲王在内的英国权贵政要和各界名流前来参观。[1]35 –38；[2]115 –118像在费城一样，“万唐人物”在伦敦一开展就受到了英国中上层社会和媒体的普遍关注，好评如潮。[1]35 –42；[2]117 –118；[8]563 –582尽管中国展的门票比一般的展览昂贵得多，但仍吸引了大批参观客，包括欧洲政要。据伦敦《泰晤士报》1844 年 10 月 17 日的报道，法国王子蒙邦西耶公爵（Duke de Montpensier，1773 – 1850）到伦敦访问时，想参观的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邓恩的“万唐人物”展。[1]35 –42；[2]118



图 4　伦敦“万唐人物”展内景②

“万唐人物”伦敦展在中国乐器的展示上基本上维持了费城展的原样。唯一的变化是增多了几件乐器。为了让英国的观众更好的了解展览会上的中国物品，“万唐人物”展的伦敦经纪人威廉姆·朗格顿（William B. Langdon）在 1842 年编辑出版了简繁两个版本的《万唐人物——伦敦中国物展目录说明册》。两个版本虽用了不同的书名，但都是介绍伦敦“万唐人物”展品的。简本正文 163 页，繁本 273 页。简本有关中国乐器的部分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只是介绍的乐器从原来的 22 种增加到了 27 种[9] 86 –87。繁本有所增大，所介绍的乐器部分在数量上虽然没变，但添加了一些解释，篇幅从原来的两页，增到了近 4 页。

① 美国学者 Haddad 认为，邓恩之决定将展品移往伦敦虽有经济、扩大影响等各方面的考虑，但更多出自他对中英因鸦片而交恶的反应。邓恩一向反对鸦片贸易，他认为中英两国需要互相了解。他相信如果把中国全面客观地展示在英国民众面前，英国民众就会改变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错误的印象。公众的舆论的改变或许会使英国政府改变对华的侵略政策。[2]115 –118

② 资料来源：Illustrated London News，August 6，1842。

如在谈到“三弦”时，繁本特地提供了伦敦展柜中的三弦琴杆“是用来自暹罗的一种特别的木制成的”、琴鼓两面蒙的是“经过鞣制的蛇皮”、有云状花纹的棕黄色的蛇皮可以发出“优美动听的音响”、中医对蛇胆很看重等信息。在介绍古筝时，也不忘提到与古筝形制相似的古琴。并以孔子和古代圣贤为例，对被称为“文士之琴”的古琴在中国精英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做了简单的提示。此外，繁本还增添了24幅插图，其中就包括两幅弹月琴、三弦、琵琶图（见图5、图6）。

不过，与邓恩不同的是，朗格顿在其增订本中也下意识地流露出了他对中国乐器的一些消极的看法，虽然这些看法并非他的原创。如在提到笙时，他就说“该乐器好像是一种构造原始的风琴”；提到唢呐的音响时，用了“震耳欲聋”、“响亮铿锵的噪音”等词句。在结尾综述时，他还一字不漏地用了卫瑛斯书中所引的“中国音阶很不完善”、“中国人对半音、对位法、多声音乐毫无所知”、“不管有多少个表演者，旋律总是一个”、“中国人从不尝试和声”类的词句。[10] 158–160



图5①



图6②

朗格顿的《万唐人物——伦敦中国物展目录说明册》在伦敦似乎很受欢迎。简版本至少重印过两次（1843年和1844年），据朗格顿自己提供的数据，从展览会开幕到1843年该书共在海德公园展厅卖出“两万六千本”[11]，到1844年重印时“已售出四万四千册”[12]。繁本卖得更好，1843年增订再版时已卖出“八万多册”[13]。简繁导览手册在伦敦的最后总销量超过了30万本。[14]虽然中国音乐在此书中所占的比例不重，但毕竟包括了中国乐器在内，此书的广泛流传对中国音乐在海外的传播应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

三、“万唐人物”的终结

1844年初，邓恩离开伦敦前往瑞士，不幸于同年9月29日在瑞士日内瓦湖北岸的风景小城沃韦（Vevey）去世。但邓恩的离去并不意味着“万唐人物”展的终结。在之后的几年里，“万唐人物”继续在伦敦公展，直到1846年10月闭馆。③[1]47–48;[2]118;[15]24–26关于“万唐人物”展品后来的去向，学者意见不一。一种说法是邓恩死后没有留下足够的经费来保障展馆的运营，为募捐朗格顿只好携带展品到各地巡展。1849年其中一部分展品在距离爱丁堡不远的地方因火车失事被毁。剩下的一些1850年被美国著名的演出经纪人巴纳姆（P. T. Barnum，1810–1891）买走，并于1851年伦敦首届世界博览会时展出[1]49–51;[2]120;[15]24–26。还有一些于1851年在佳士得被拍卖。[3]66;[14]35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巴纳姆买的不是邓恩的展品。[2]120;[15]24–26

四、“万唐人物”展的意义

关于“万唐人物”展之类的博览会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重要性，近年来已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知。有学者甚至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社会大众对于其他社会、文化的印象，主要系得自博览会、照片和明信片”[16]826。值得注意的是，邓恩

① 资料来源：Langdon,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Relating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London, 1842), opp. 64。

② 资料来源：Langdon,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Relating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London, 1842), opp. 70。

③ 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见文末参考文献[2]，第102页。

的“万唐人物”展是在 19 世纪中叶世界博览会兴起之前，其重要意义毋庸赘言。邓恩的展览（特别是在伦敦的展览）虽有“炫奇”的因素，[14]35但也起到了展示中国文化的作用①。

具体到邓恩收藏中的乐器，其意义在于它为美国和英国人提供了通过实物了解中国音乐文化的机会。在“万唐人物”展举办之前，不仅很少有美国人对中国乐器及音乐在中国社会中的功用有直观印象，即使是欧洲人也很少有目睹过中国乐器的。在今天看来，收集和公开展示 20 多种中国乐器似乎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美国乃至与中国交往很久的欧洲却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虽然早在 18 世纪中下叶，在北京的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 Joseph – Marie Amiot，1718 – 1793）就开始将明清仪典祭祀所用之乐器及乐舞图示寄往法国②，1770 年代，东印度公司大班英国人白立把（Matthew Raper，c. 1741 – 1826）也曾将一些中国乐器寄给伦敦的音乐史家查尔斯·伯尼（Charles Burney，1726 – 1814）[17]546，但像邓恩这样规模的搜集并公开展示还是前所未有的。

同样，在海外展示包括乐器在内的中国艺术品乍看起来也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以费城人为例，早在 1796 年，东印度公司的一位荷裔美籍雇员范罢览（A. E. van Braam Houckgeest，1739 – 1801）就在费城东北的克劳伊顿建筑了一个中国式的住宅，并展示了他从中国带回的大批字画、中国风景人物彩绘、镌刻及多件艺术品。[18]179 – 193但是范罢览的展览是临时性的（只是在 1796 年夏小展了几个月），且只在美国上流社会小范围内展出，对美国的公众影响不大。[2]1 – 2另外，范罢览的展品主要以绘画为主，而不是像邓恩的中国展一样包罗万象。虽然他的艺术品收藏中含有 30 多幅彩绘中国妇女演奏多种乐器图，[19]312根据他收集的中国彩绘出版的画册在欧洲也流传甚广，[18]189但有关音乐的实物极少。而邓恩的收藏则不同，除在费城和伦敦公开展示近 8 年外，包括乐器介绍的“万唐人物中国万物展”说明书就出版过多种版本。以上提到的邓恩自己编纂的 120 页的《万唐人物——费城中国万物展目录说明册》两年之内仅在费城一地就至少售出 5 万本。[2]115

在邓恩的“万唐人物”展之前，西方人对于中国乐器的直观印象主要来自书本③。但即使是书本中所提供的中国乐器图示也并不多见，且错误百出。如 17 世纪法国著名数学家和修道士马林·梅森（Marin Mersenne，1588 – 1648）在其讨论乐器书中提供过一幅中国笙的图示，但他竟然将笙说成了印度乐器。1723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博纳尼（Filippo Bonanni，1638 – 1725）在罗马出版的一本论述古代的乐器及演奏者的书中也附有 7 幅中国乐器的图例，[20]6但博纳尼和梅森一样，也把其中的一件乐器张冠李戴的配上了印度舞孃。[20]71751 年到北京的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 Joseph – Marie Amiot，1718 – 1793）在其《中国古今音乐篇》（1779 年在巴黎首版）一书中对中国乐器有比邓恩详细且精确得多的叙述，并附有多幅图示。[21]241 – 243但钱德明书中的乐器图示以宫廷庆典和宗庙祭祀用的雅乐乐器为主，很少有俗乐乐器的图例。1810 年代出版的关于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Henri – Léonard Bertin，1720 – 1792）中国收藏的《中国：其服装、艺术、制造及其他》一书虽含有以下中国乐器和中国人奏乐的图示，[22]12 – 24但远不如邓恩“万唐人物”展中的乐器多。1793 年赴华英国使团总管巴罗（John Barrow，1764 – 1848）的《中国游记》（1804 年

---

① 古伟瀛通过对各国赛会公会档案文献记载进行量化统计分析的办法，认为 19 世纪兴起的世界博览会经历了一个从“炫奇”、“赛珍”到“交流”、“商战”的过程。参见古伟瀛：《从“炫奇”、“赛珍”到“交流”、“商战”：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一个侧面》，载《思与言》，1986 年，第 3 期。

②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皮卡尔（Francois Picard）在其 2001 年发表在钟鸣旦主编的《中国基督教手册》第一卷中的《音乐》一节中提到钱德明 1776 到 1779 年间“寄乐器、乐谱到欧洲”这一事实。详见 Francois Picard：“Music”in Nicolas Standaert ed.，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 635 – 1800. Leiden：Brill，2000：855. 参见宫宏宇：《钱德明、朱载堉与中国礼仪乐舞之西渐》，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

③ 笔者所见最早提到中国乐器的是 1556 年抵达广州的多明我会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达·路士（Gasper Da Cruz，1520 – 1570），但他没有提供图示。见 C. R. Boxer，ed.：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 Century（1550 – 1575）：Being the Narrative of Galeote Pereira，Fr. Gaspar da Cruz，O. P.，Fr. Martin de Rada，O. E. S. A. London：Hakluyt Society，1953：144. 此书有何高济中文译本，见《十六世纪中国南部纪行》，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01 页。

在伦敦首版）一书中虽附有比邓恩“万唐人物”展还多的乐器图示，但他的乐器是一位“在广州的英国绅士辛辛苦苦地搜集来的”，巴罗只是请人临摹其影像，然后包括在他的书内而已。[23]315 作为一个穷途末路来中国讨生活的商人，邓恩能有意识地搜集包括中国乐器在内的中国物品，并将之作为教具公示于世①，这不能不说是他的过人之处。向西方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也是其“万唐人物”的真正意义所在。



图7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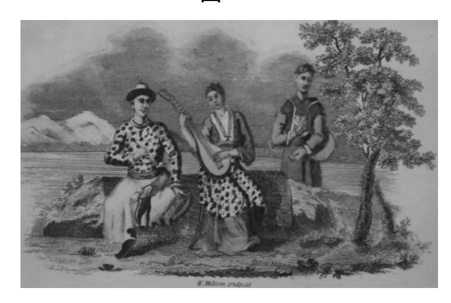


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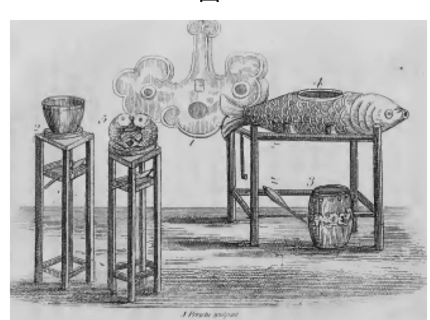


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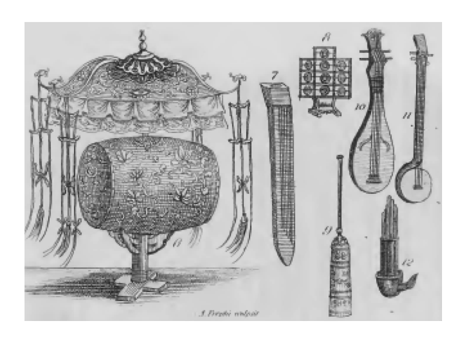


图10

参考文献：

[1] Helen Saxbee. An Orient Exhibited: *The Exhibition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 England in the* 1840*s* [D]. London: Royal College of Art, 1990.

[2] John Rogers Haddad. *The Romance of China*: *Excursion to China in U. S Cultur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Nancy B. Wilkinson. The Chinese Collection of Nathan Dunn: Its Origin, Travels and Influence on the Arts of Britain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the Arts in Society* 3. 2009 (4): 61 – 69.

[4] Nathan Dunn.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The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 Philadelphia* [M]. Philadelphia: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 1839.

[5] Jonathan Goldstein. A Philadelphia Author Turns to China: Robert Waln, Jr., as America's First sinologist [J]. *American Asian Review* 21. 2003 (3): 187 – 203.

[6] William W. Wood. *Sketches of China* [M]. Philadelphia: Carey and Lea, 1830: 155.

[7] E. C. Wines. *A Peep at China in Mr. Dunn's Chinese Collection* [M]. Philadelphia: Printed for Mr Dunn, 1839.

[8] Anonymous. Review of William Langdon's "Ten Thousand Things" [J]. *Chinese Repository* 12. 11 (November 1843): 563 – 582.

[9] William B. Langdon.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now Exhibi-*

① 关于“万唐人物”展的教育初衷，美国学者 Haddad 有详细论及，见文末参考文献[2]，第 86 – 120 页。

② 图 7 – 10 资料来源，见文末参考文献[22]。

ting at St. George's Place, Hyde Park Corner, London [M]. London: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 1842.

[10] William B. Langdon.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Relating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An Epitome of the Genius, Government, History, Literature, Agriculture, Arts, Trade,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Life of the People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Together with a Synopsis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M]. London: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 1842.

[11] William B. Langdon.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now Exhibiting at St. George's Place, Hyde Park Corner, London* [M]. London: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 1843: 扉页背面.

[12] William B. Langdon.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now Exhibiting at St. George's Place, Hyde Park Corner, London* [M]. London: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 1844: 扉页背面.

[13] William B. Langdon.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Relating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An Epitome of the Genius, Government, History, Literature, Agriculture, Arts, Trade,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Life of the People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Together with a Synopsis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M]. London: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 1843: iii.

[14] Catherine Pagani.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and British Perceptions of China in the Mid – Nineteenth Century [J]. Tim Barringer and Tom Flynn eds. *Colonialism and the Object: Empire,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Museum*. London: Routledge, 1998: 28 – 40.

[15] Haddad. The Romantic Collector in China: Nathan Dunn's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J].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21. 1 (Spring 1998): 7 – 26.

[16] 张瑞德. 想象中国：伦敦所见古董明信片的图像分析 [G] //张启雄. "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文选集：下册.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805 – 830.

[17] David Clarke. An Encounter with Chinese Music in Mid – 18th – century London [J]. *Early Music*, 38. 4 (2010): 543 – 557.

[18] George R. Loehr. A. E. van Braam Houckgeest: The First American at the Court of China [J].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 15. 4 (1954): 179 – 193.

[19] A. E. van Braam Houckgeest.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 – India Company, to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the years* 1794 *and* 1795 [M]. London: Printed for R. Phillips, 1798. Volume 2.

[20] Frank Ll. Harrison. Observation, Elucidation, Utilization: Western Attitudes to Eastern Musics, ca, 1600 ca. 1830 [J]. Malcolm H. Brown and Roland John Wiley eds. *Narratives Slavonic and Western Music: Essays for Gerald Abraham*. UMI Research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 – 26.

[21] Joseph – Marie Amiot. *Mé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 [M]. Paris, 1779.

[22] J. B. J. Breton De La Martinière. *China, Its Costume, Arts, Manufactures, &C.: Edited Principally from the Originals in the Cabinet of the Late M. Bertin, with Observations Explanatory,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M]. London: Printed for J. J. Stockdale, 1812. Volume 3.

[23] 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M].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4.

【责任编辑：吴志武】